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技术统治论之比较

刘光斌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对技术统治论进行过研究。在技术统治论的逻辑起点方面, 他们围绕工具理性展开分析, 马尔库塞认为理性就是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构成了技术统治论的逻辑起点, 哈贝马斯则指出理性概念包含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 理性并不是技术统治论必然产生的逻辑起点。在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方面, 马尔库塞指出随着技术理性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 技术进步强化了统治效应; 哈贝马斯则认为技术是中立的, 无法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在技术统治论的民主走向方面,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统治论维护了一个极权社会, 对民主的追求促使他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审美之维, 哈贝马斯则主张为技术的应用划界, 走向了一种商谈民主政治。分析比较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上述观点, 就他们的技术统治论立场而言, 马尔库塞赞成技术统治论, 哈贝马斯则反对技术统治论。

关键词: 马尔库塞; 哈贝马斯; 技术统治论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6-0055-07

随着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应用, 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西德理论界的关注, 并就科技进步后果展开讨论, 由此形成了西德的技术统治论, 即由科学家、技术专家等治理国家。技术统治论有时也被视为对技术决定论的发展, 认为技术能够解决一切发展问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也卷入这场争论之中。哈贝马斯指出马尔库塞参与到这场争论之中: “这次讨论同雅克·爱律尔(Jacques Ellul)、阿尔诺特·盖伦(Arnold Gehlen)和阿尔伯特·马尔库塞的论点有关。”^{[1](258)}哈贝马斯的传记作者奥斯维特印证了哈贝马斯这一时期对技术进步的理论关切: “他的立场可以被看作是 50 至 60 年代从左翼对西德技术决定论思潮进行的批判。”^{[2](20)}可见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都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进步及其产生的广泛影响, 并形成了有关技术统治论的基本观点。研究比较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技术统治论, 对我们了解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技术统治论的理论出发点、论证思路、基本立场以及正确看待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技术统治论与理性观念: 何种理性会导致技术统治论?

何种理性会导致技术统治论?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

斯不约而同地把技术统治论与理性观念结合起来, 考察了技术与理性的关系。受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工具理性范式的影响, 两人都从工具理性出发分析技术政治论, 并视工具理性为技术统治论的逻辑起点, 即工具理性的应用导致了技术统治论的出场。马尔库塞提出了技术理性观, 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包含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两个方面。由于他们对理性概念的理解不同, 尤其在哈贝马斯那里, 究竟何种理性或理性的哪一方面会导致技术统治论, 还需要我们详加考察。

韦伯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中把工具理性与统治结合起来, 他把合理性视为“目的合乎理性的”和“价值合乎理性的”^{[3](56)}两类合理性, 前者以目的-工具行为为取向, 是一种形式合理性, 后者以价值追求为取向, 与价值和伦理有关, 强调内容的合理性。西方社会的合理化主要符合工具理性的逻辑, 以目的-工具行为为行为取向, 并造就了总体性的官僚政治。马尔库塞把韦伯的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概念解释成技术理性, 以支配人从事生产和改造自然的体系方式存在。他认为所有事物都能抽象化为数量关系, 行政机构的效率也能够计算出来, 并用数量关系表示出来。马尔库塞指出韦伯在解释生产效率和官僚政治统治效率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过他认为韦伯在解释发达工业社会的价值问题时存在不足, 理由是在韦伯那里,

收稿日期: 2018-03-16; 修回日期: 2018-06-0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启蒙辩证法》及其影响研究”(17YBA094)

作者简介: 刘光斌(1978—), 男, 湖南洞口人, 哲学博士,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 联系邮箱: liuguangbin2006@163.com

技术理性是中立的,马尔库塞则认为技术理性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和马尔库塞一样,哈贝马斯注意到工具理性批判与韦伯形式合理性之间存在密切的理论关联,不过不同于马尔库塞把韦伯的工具理性解释为技术理性的做法,他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并吸收了韦伯的价值合理性观点。他认为社会由系统和生活世界双重结构构成,各自遵循相应的合理化模式。一方面他吸收了韦伯工具合理性的观点,指出技术带来了官僚政治的统治效应,并认为这是经济和政治子系统工具性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吸收了韦伯价值合理性的观点,认为在生活世界中需要发挥交往理性的规范调节作用。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工具理性是中立的,当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经济和政治系统干预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生活世界时,就产生技术统治效应。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中,一切都可以视为商品来对待,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所有一切都可以简化为各种数量关系,在商品生产、交换和消费关系中的人也成了可计算的数量。卢卡奇注意到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关系的产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生产出了越来越多的商品,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扩张,物化关系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工具理性思维和物化意识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是物化的重要工具,理由是技术带来了“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4](153)}的物化。在这个以技术为中介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最终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工人受到机器的控制,人的尊严受到伤害,技术被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工人、组织者和管理者都被纳入技术系统中。技术作为新的更加隐蔽的统治和奴役的方式,把这种统治和奴役扩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物化凭借其技术形式造成了极权主义。尽管同样受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哈贝马斯主要把物化意识与工具理性联系起来。他认为“决定物化意识的是‘工具理性’”^{[5](362)},工具理性是用主客体关系概念来加以阐述的,反映在理论层面就是遵循了同一性原则,“同一性思想事实上是一种‘被物化’的思想形式。同一性思想把不同事物转变成一样的事物”^{[6](304)}。工具理性的思维形式把人和物都看成是同样的事物。可见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都把物化批判与一种工具理性分析结合起来,解释了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技术统治效应。不同之处在于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工具性应用造成了物化,工具理性是物化的工具,哈贝马斯则着重分析了工具理性产生的物化意识。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启蒙对工具理性的依赖是启蒙演变为神话的根源。启蒙理性已经退化为工

具理性,表现为数学逻辑的可计算、手段和工具的目的性。启蒙精神的张扬推动了工具理性的膨胀,促进了科技的进步,技术理性的进步与科技进步已经如影相随。为了自我持存或自我生存的需要,人们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把工具理性运用于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把征服自然的方式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广泛的社会统治效应。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7](2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确立了工具理性批判范式,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尔库塞赞同他们对工具理性的分析和启蒙走向它的反面的观点,这启发他把工具理性做了技术理性的解释,并应用于发达工业社会的分析之中。他认为“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4](108)},而这个利用科学和技术组织起来的发达工业社会能够更加有效率地统治自然和人,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极权社会。这与启蒙演化成神话的结论同出一辙。哈贝马斯反思了《启蒙辩证法》中的工具理性思想与韦伯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我认为《启蒙辩证法》是接受韦伯的关键。”^{[5](348)}在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中,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是可计算的,能够用数量关系表示出来。这在实践层面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用操纵自然的方式去统治人,征服自然与控制人类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一性思维追求的是用科学技术征服外在自然,人出于自我持存的考虑,把同一性思维运用于社会统治之中,对外在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控制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工具理性使得‘对内部和外部的控制成为生命的终极目标’。”^{[5](362-363)}面对工具理性及其同一性思维对自然和人的统治这种状况,要避免启蒙变为神话,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工具理性之外发展出一种交往理性,来超越早期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范式。他对工具理性范式的反思为批判理论指出了新方向——“向交往理论的范式转向”^{[5](369)}。

综上,在回答何种理性会导致技术统治论这一问题上,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吸收了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工具理性范式中的理论成果,都从工具理性出发分析技术统治论。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是他们分析技术统治论的共同逻辑起点。不过两人的分歧也较为明显,在马尔库塞那里,他所说的理性是指技术理性,且技术理性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概念包含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两个方面,工具理性成为他分析技术统治论的出发点。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并不是不要工具理性,而是强调工具理性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界限,在工具理性不能

适用的生活世界领域中则需要发挥交往理性的作用，技术统治论从理论上回应了工具理性的扩张突破界限并压制了交往理性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在马尔库塞那里，理性成为技术统治论的逻辑起点是不存在争议的。但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理性包含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两个方面，理性究竟能不能成为技术统治论的逻辑起点就需要甄别了：理性的工具理性一面构成了技术统治论的逻辑起点，理性的交往理性一面则为摆脱技术统治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二、技术统治论与统治效应：技术进步一定带来统治效应吗？

技术以及技术进步是否带来了统治效应？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分歧。马尔库塞指出作为新的控制形式的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功能，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哈贝马斯则认为技术是中立的，他批判了马尔库塞“关于科技进步的双重功能(作为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论点”^{[8](47)}，认为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统治效应。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包含着统治形式而且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4](126)}，日益自动化的生产和技术装备并非作为单纯工具的总和，技术、技术设备及其应用总是与社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并作为一个技术统治系统发挥作用。这个技术系统不仅控制了产品的生产，激起了人们的消费愿望，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愿望，而且控制了满足这个技术社会系统运作需要的一切技能、生活态度、职业及其人生规划。马尔库塞不认为技术是中立的，认为技术具有为社会统治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色彩，借助于技术这种新的令人愉悦且高效的控制形式，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技术成了融合文化、政治和经济的黏合剂，弥合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缝隙，整合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制度，并一举改变了传统的暴力恐怖控制形式。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是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是相对于传统的物质匮乏社会的控制形式而言的。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中，人的行为受到制约，为自我生存而斗争，自由因为物质匮乏而受到控制。在阶级对抗性的关系中，通过暴力控制自由是主要的统治手段。发达工业社会已完全不同于一个物质高度匮乏的社会，它是一个富裕社会，需要对这个社会中的自由进行重新考察。在一个富裕社会中，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使受制于低生产效率的各种自由失去了之前的内容，自由逐渐增大并提高了自由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因为高度进步的技术和机械化的

工艺程序，将人从长时间的生产劳动以及劳动强加给他的那些需要中解放出来，为他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去满足他的真实需要，并进入到自由领域。技术为个人的发展和个人追求美好生活创造了条件，这应该是技术进步需要呈现的目的。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这种情况并没有实现，相反的情形是“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4}。导致这一情形出现的根源是社会采取了技术这种新的控制形式。技术带来的丰富的物质文化成为压倒性的统治，人们追求的自由也只能是虚假的，因为“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4](8)}。技术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却不考虑人们能够选择什么和实际选择了什么。这种自由是虚假的，因为个人只是自由地重复强加在他身上的虚假需要，并没有实现他的意志自由，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哈贝马斯反思了马尔库塞的技术进步观，他认为借助于专业知识和技术控制形式，促成了技术与统治的融合，形成了自成系统的技术政治社会，造成理论与实践关系形式上的紧张。具体来说，第一，技术与政治的结合越发紧密。政治系统屈服于技术的控制，追求统治效率，节约统治成本，越来越借助于类似于控制自然的方法，国家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政治统治和解决社会控制的问题。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政策的制定越来越依靠专家的建议，“专家现在已经成为政府及其各部门实际的政治制定者”^{[9](19)}，公众越来越少地参与到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中，政策和决策越来越多地符合以工具理性为选择标准的技术策略。第二，形成自成系统的技术政治社会。哈贝马斯指出：“在这个先进的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工业和管理，构成了一个循环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对技术(有经验科学保障的技术)的有目的的、合理的使用。”^{[1](238)}技术已经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自成一个循环系统，取得了合法性。为了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在技术应用及其强势影响下，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一直在做出调整，这为技术统治论的出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和可行性。第三，理论与实践关系形式上的紧张。与马尔库塞明显不同的是，哈贝马斯从实践角度反思技术进步，认为技术进步不能回答实践问题，“科学化的文明也不能不回答实践问题”^{[1](238)}。他认为当人们不再寻求通过实践理性达成共识时，代替达成理性共识的实践理性就被非实践的、完美的管理方式取代，采用技术力量支配社会历史成为可能，实践理性要求

的规范性内容却得不到重视。这导致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紧张,表现为借助于经验分析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实践问题,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真正困难就是无法把技术力量和实践力量区分开来。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8](39)}哈贝马斯对此观点展开批判,他认为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主张技术能够解决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因此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可以归结为更加合理的技术问题,可以用解决技术问题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这种意识形态的诱惑相较于以往的意识形态而言具有新的特点:① 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不像旧的意识形态以不加改进的剥削和压迫的方式建立在集体的压制上,而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剥削和压迫方式,人们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压制。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性较少,或者说是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它使统治的合法性获得了新的形式。② 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凭借对个人需求的补偿来培养人民对政治制度的忠诚感,这种做法通常令人难以拒绝。发达工业社会依靠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舒适,以此培养人们对制度的忠诚。哈贝马斯指出,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通过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并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结果无视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有学者概括了哈贝马斯的基本观点:“科学和技术在当代社会发挥了意识形态作用——破坏了交往过程。”^[10]哈贝马斯认为为了揭示技术统治论的实质,就需要“把一个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或者社会生活的世界(社会生活的世界似乎包含在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中)和前进中的技术系统加以区分”^{[1](269)}。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是相互区分的,在其后期著作中是生活世界与经济、政治子系统的区分。与这种区分相对应的是不同的行为模式的区分。哈贝马斯指出,如果我们的行为由制度框架决定的话,那么从规范上人们受法律效力的行为期待的控制和强制。与之相对应,如果我们的行为由技术系统规定的话,我们的行为就同工具的或战略的行为模式一致,人的行为被理解为对变换着的环境的适应性反应。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就存在于技术系统与制度框架之间的关系理解中。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技术进步方向应该置于制度框架的引导下,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表明制度框架变成了技术系统的一部分。哈贝马斯揭示了技术统治论意识形态的诱惑,即“把充满冲突和落后的制度框架本身设计成前进中的技术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并且让这个

制度框架同技术进步同步前进”^{[1](272)}。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技术的中立性,技术进步在系统领域不会产生统治效应,只有当技术的应用干预了生活世界,或者说,把制度框架视为技术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的时候,才会产生统治效应。

三、技术统治论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制度是否有可能?

技术统治论能导向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吗?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认识较为一致,即技术统治论为社会统治做了理论上的辩护却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在追求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路径上两人产生了深刻的理论分歧,马尔库塞在其后期理论中求助于一种审美之维,哈贝马斯则讨论了技术与民主的关系,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商谈论证的道路。

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4}这个极权主义社会的高生产率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满足了人们的消费,也在全社会实施了政治统治,并把这种统治扩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主义的全面管理限制了从技术方面可以获得的自由时间,限制了满足个人根本需要的商品、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质量,限制了能够理解和实现各种自我决定的自我意识。面对组织者和管理者越来越依靠他们所组织和管理的机器的情况,马尔库塞提出了典型的技术统治论命题:“技术人员具有统治权吗?或者,他们统治的是那些依赖他们作为其设计者或执行者的人吗?”^{[4](32)}马尔库塞引用米查姆的话阐释了技术统治论的基本观点,他说:“今天,高技术军备竞赛的压力使做出重要决策的初始权力从有关政府官员手中,转到了受雇于大工业帝国并对其雇主利益负责的技术员、设计者和科学家手中。”^{[4](32)}这种技术统治论表明技术人员、专家和科学家在政治统治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这个社会正在利用技术形式按照自己预定的方向不断扩张,这个技术社会系统最终形成了一个单向度极权社会,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

与马尔库塞一样,哈贝马斯指出技术统治论看似前景美妙,实则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他在《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描述了技术统治论的前景:“也许能够首先对个别部门,然后对某些部门,接着对局部系统,最终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成功的调整,以致使这些部门和系统的工作能够自行调节和在内外条件变化不定的情况下以最佳状态保存自己。保证社会劳动领域中和强大的自我维护领域中的最大限度的可靠性的

人—机系统，将成为全部社会关系的组织的楷模。”^{[1](272)}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统治论虽然还没有实现，却是一种发展趋势。不过从技术与民主的关系来看，一个社会系统仅仅依靠技术理性是无法获得合法性的。在他看来，所谓技术是指“对对象化过程的科学上合理的支配”^{[8](91)}，哈贝马斯经常把技术与经济、政治子系统结合起来研究；所谓民主是指“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形式”^{[8](91)}，体现了公众讨论基础上的商谈共识。哈贝马斯指出即使技术统治论的梦想能够实现，那么在此期间，技术统治论也无法摆脱价值系统的规范和引导，也就是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不能放弃对民主的追求。哈贝马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不应屈从于技术统治论的决定论倾向，应该掌握自己的社会命运。他指出技术统治论的主要问题是未能阐明“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的关系这个问题。生活世界中要解决的问题必须通过与日常语言相联系的交往行为和共识来解决，而现在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构成的系统，以至于人们不能对技术进行反思，也就是没有处理好技术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技术的应用干预了民主的实现。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尔库塞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在技术统治论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情况下，民主政治制度何以可能？马尔库塞对改变极权社会持一种悲观态度，不过在其理论发展后期他仍然对改变技术造成的极权社会保留了一点希望。马尔库塞指出：“生产关系的变化不可能通过所有制关系的改变来实现，而只能唯一地通过一种技术合理性本身的变化来实现。”^{[4](209)}这一点反映了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不同，他认为社会不是来自内部的经济关系的变革，“质变看来只有作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变革才能可能”^{[4](47)}。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和古典美学理论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外部变革之路。马尔库塞认为人的解放在于审美的感性解放，他并不赞同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寻求社会主体的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改变，改变技术理性的支配地位，恢复感性在技术社会中的地位，实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形成新理性。摆脱以技术力量为代表的“理性”控制不能完全依靠理性，而需依赖艺术美学，这种艺术美学蕴含着尚未被控制的潜能，蕴含着改变技术社会的机会。这条审美之路强调人的美感、快感的释放和激发出人的潜在本能，这开启了“由社会物质生产方面的变革转向心理观念方面的变革”^{[4](11)}。马尔库塞认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富裕已经改变了革命的客观条件，只能从革命的主观条件方面寻找革命的出路。他寄希望于“审美之维”的革命，造就一个具有新感

性的“新人”，正是这些个体的联合形成了推动历史进程的历史主体，未来社会的希望在于具有新感性的“新人”。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在于它不能实现人的本能需求，即人性的实现。

哈贝马斯指出技术与民主的应用范围各有其界限，又互相渗透，于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关涉运用技术推动公民达成共识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必须“发起一场把社会在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上的潜力，理性地、负责任地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政治上起作用的讨论”^{[1](274)}。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统治论是自圣西门到培根以来的理论传统，其主要的特征是政治家成了拥有科学知识的人，也是所作决定的执行人。因此，那些专家也可能成为政治家，并对具体情况下的技术、资源、最佳战略和控制手段等的使用做出决策。技术统治论的缺陷是把技术进步的内在强制归功于社会利益的自发性，且技术和战略不能全部解决实践问题，或者说用技术手段来解决价值问题，结果是“把政治统治还原为合理的行政管理，只能被设想为以全部民主为代价”^{[8](103)}。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公共舆论了解公众的合理要求才能有利于启发政治活动家参照技术上的可能和可行情况，从而改变想当然的态度，同时政治活动家们根据专家和公众讨论中所表达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推广技术知识以推动科技进步。科学技术确实提供了有效的控制社会的方法，而这些技术应该如何运用到社会中，则需要进行大量严肃的、科学的反思。哈贝马斯认为技术以工具理性的形式存在于经济和政治子系统之中，技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政治运行效率都是必要的，这就为技术应用划定了边界。经济和政治子系统必须在自身的范围或界限内活动，不能干预生活世界，并且接受生活世界的规范。为摆脱子系统干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主张一种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商谈民主政治，充分反映人民的政治意志。哈贝马斯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带来的统治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是技术统治论无法解决的。他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置于技术系统内，并为其应用划定界限，以普遍的和自由的讨论克服技术统治论的非理性。

四、技术统治论：赞成还是反对？

目前，学界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比较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技术类型、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等方面。但在两人技术统治论的

比较研究方面还没有相关成果,本文力图从技术统治论的逻辑起点、技术进步带来的统治效应以及技术统治论的民主问题三个方面分析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基本观点,并进行比较分析。

第一,就技术统治论的逻辑起点而言,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认为技术统治与工具理性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马尔库塞直接把工具理性发展为科技理性,哈贝马斯则把工具理性与科技应用结合在一起,工具理性成为他们分析技术统治论的逻辑起点。不过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概念还包含了交往理性,这恰恰构成了他批判技术统治论的理论依据。

第二,就技术统治论的统治效应而言,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注意到科技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但在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了明显分歧。马尔库塞主张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作为新的控制形式维护社会统治。哈贝马斯则主张技术是中立的,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种诱惑,“通过有计划的诱惑,特别是主体自由领域(选举、消费和自由时间)中的诱惑,间接控制增强了,而借助于主体内在规范的控制似乎减弱了”^{[1](273)}。因此,从哈贝马斯的立场看,科技进步不一定带来统治效应,只有当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政治系统干预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生活世界才会产生统治效应。技术统治论把工具理性扩展至生活世界,虽然产生了统治效应,但无法为技术统治论提供合法性。

第三,就技术统治论的民主发展前景而言,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认为技术统治不能带来民主,但在追求民主的方案上却产生了分歧。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描述了一个极权社会,尽管他后期转向审美之维的革命,寻求新人,然而很难在一个技术系统中看到民主的前景。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统治论强调专家和利益集团的作用,把公众排除在外,势必缺乏民主的根基。哈贝马斯指出:“一旦与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系统性需求发生冲突时,一种没有民主根基的技术统治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充分重视选民对社会正义、地位安全、公共服务和集体物品要求的动机。”^{[11](11-12)}这是哈贝马斯在2015年出版的《技术统治论的诱惑》一书中的一个观点。恰如该书的书名,哈贝马斯指出,技术统治论没有民主根基,不可能实现民主,只是一种诱惑,民主的实现只能求助于一种商谈民主政治。

总之,马尔库塞把工具理性发展成为技术理性,解释了技术是意识形态,技术进步带来了统治效应,并提出用新理性产生良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哈贝马斯则认为技术作为工具理性是中性的,当它应用于生

活世界便产生技术统治论的统治效应,他指出一种交往理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商谈民主政治才代表未来民主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技术统治论观点的上述异同,反映了两人在技术统治论上的基本立场。我们认为马尔库塞后期思想尽管转向审美之维,仍无法改变其赞成技术统治论的基本立场。英国学者阿比奈特在《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一书中用“技术统治论的起源: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12](92)}这一小节,讨论了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的观点。他认为,“马尔库塞对于科学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技术控制体制之间关系的阐释”^{[12](100)},集中体现了马尔库塞技术统治论的立场。哈贝马斯自始至终对技术统治论持反对立场,从他对理性概念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马尔库塞仍然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的分析传统,哈贝马斯则提出了与工具理性相对的交往理性,他们在技术统治论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对理性概念理解的分歧在反思技术进步和实现民主制度问题上的延伸。他们的技术统治论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对我们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德理论家关于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的争论提供了启示,同时为我们理性思考技术统治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理论启示。技术在现代社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摆脱技术对人的控制,让技术更好地为人的自由和美好生活创造条件,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理论与实践[M]. 郭官义, 李黎,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2] 奥斯维特. 哈贝马斯[M]. 沈亚生, 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3] 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上卷[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6.
- [4]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5]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6] 衣俊卿.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 超越物化的狂欢[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 [7]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8] 莱斯利·A·豪. 哈贝马斯[M]. 陈志刚,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9]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李黎, 郭官义,

-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10] GRAEME KIRKPATRICK. Evolution or Progress? A (Critical) Defence of Habermas'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J]. Thesis Eleven, 2003, 72(1): 91-112.
- [11] JÜRGEN HABERMAS. The Lure of Technocrac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 [12] 阿比奈特. 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M]. 王维先, 马强, 嵇明亮,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Comparison between Marcuse' and Habermas' technocracy

LIU Guangbin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Both Marcuse and Habermas have studied technocracy, and in terms of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echnocracy, their analysis revolves around the connot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Marcuse believes that rationality is technical rationality, which constitute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technocracy, while Habermas points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reason contain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nd that rationality is no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technocracy. In the ideological aspect of technocracy, with the social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Marcuse points out that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has become political rationality, while Habermas believes that technology is neutral, unable to provide legitimacy for politics. In the democratic trend of technocracy, Marcuse believes that technocracy is designed to preserve totalitarian society, which means that his pursuit for democracy drives him to Marxist dimension of aesthetics. Habermas advoc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demarcation, which indicates his turning to a communicative democratic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rcuse and Habermas in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reveals that, as far as their technocracy is concerned, Marcuse is in favor of technocracy, while Habermas is against it.

Key Words: Marcuse; Habermas; technocracy

[编辑: 胡兴华]